



# 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辩护业务资讯

上海市律师协会

刑事诉讼法与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

[2024 年第 5 期]

主任：  
王思维

副主任：  
易国勇  
傅建平  
沈 宁

编辑人员：  
郭 亮      李瑞阳  
随鲁辉      张佰乐

执行编辑：  
李瑞阳

■ 行业简讯

- P1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证据制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 新法速递

- P8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 P18 四部门印发《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 刑辩实务研究

- P28 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工程建设领域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 行业简讯

##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证据制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来源：法治网



5月19日，值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庆十八周年之际，“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证据制度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重庆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就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建设与证据法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研讨。

开幕式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中主持，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院长王旭致辞。主旨发言环节由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龙宗智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若干问题探讨》为题，基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供给不足的现状，就证明标准与证据种类的改进

等问题发表了观点，并强调刑事诉讼法要重视并强化科技的适用性和探索性，促进刑事案件办理的科学、公正和高效。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樊崇义，以《用司法现代化的理念和要求奋力推进证据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为题，提出应按照中国特色司法现代化理念的标准和要求，推进证据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推进司法模式向科学民主文明的转型；他还探讨了本次刑诉法修改的法律渊源，并对证据规则的体系化和系统化、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以及涉外刑事司法的相关问题发表了见解。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卞建林，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写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为题，指出我国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发展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应当回归诉讼证明的本质，将理论研究和立法的重点集中到庭审的证明规则。他进一步论述了要纠正将刑事证明完全等同于认识活动的传统观念，探讨诉讼证明的价值范畴。要正确认识诉讼证明的功能，重视被告方的证明权利，理顺诉审的关系。要实现证明价值观的多元化，针对不同案件采取差异化的证明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张保生，以《中国现代刑事证据制度建设理论反思——〈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探讨》为题，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目前已具备了现代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要素和体系框架，但还存在着内容陈旧和结构失衡两大问题。刑诉法再修改宜采用“软件升级”方法，从确立以相关性原则为主线的逻辑理念和以基本权利保障为取向的价值理念入手，以证据理念更新推动现代刑事证据制度发展，完善举证、质证和认证制度，为庭审实质化创造条件；完善证据排除规则，促进刑事证据法从合法性“一枝独秀”到可采性“春色满园”的结构性



转变，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或借鉴传闻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进一步完善。

第一单元主题发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黄永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以《刑事诉讼法典化背景下证据制度的完善》为题，提出在法典编纂视角下，重新整合既有的法治资源，完成刑事诉讼证据规范的完备化与体系化：确立证据裁判原则与自由心证原则，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责任体系；建议保留现行法律关于证据种类的封闭式规定；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确非法实物证据范围；增加认罪认罚程序的证据规定，准许被追诉人行使反悔权；明确被告人的对质权。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以《刑事诉讼法修改如何构建科学的证据制度》为题，从中外比较、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刑诉法修改指导思想、证据规则修改的具体内容等方面，针对完善我国证据法律体系、庭审实质化改革配套规则、调整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引入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等提出建议。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汪海燕，以《“以审判为中心”与证据制度的完善》为题，立足“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视角，探讨了证据制度完善这一主题。他提出，以审判为参照，对证据基本原则进行修改，明确证据裁判原则，减少口供依赖；明确分案审理条件，扩充有关分案审理程序的证据规则；重视建设涉案财物证据制度。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胡铭，以《数字时代刑事证据法的三元结构》为题，认为数字时代的刑事证据法，需承认传统证据的数字化与传统证据、数字证据共存这一三元结构形式。在这一

全新证据结构下，应对证据的“三性”即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问题重新予以审视。

第二单元主题发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黄卫平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以《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基本思路》为题，就如何解决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广受各界重视的问题指出，证人不出庭作证会导致审判流于形式，被追诉人的质证权与辩护权形同虚设，为冤错案的滋生提供温床。解决证人出庭问题，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涉及中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乃至法治社会建设的政治问题。证人出庭作证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现行刑诉法给予了法官在判断“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为针对性解决这一制度缺憾，刑诉法修改应从确定证人出庭适用范围、细化证人出庭条件、解决庭外证言的证据能力、完善证人未出庭情形的救济措施四个方面加以解决。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熊秋红，以《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之完善》为题，指出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开启了我国刑事诉讼从传统阅卷制度向证据开示制度的转变，在实质上形成了混合型证据开示模式，它存在被追诉人阅卷困难、认罪认罚程序与其他程序开示制度缺少分流、证据开示制度失之笼统、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缺失四大问题，这些是证据开示制度建设的完善方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姚莉，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电子证据制度之完善》为题，指出技术进步以及随之产生的电子证据这一新问题，存在证据种类缺失、电子证据的收集与提取

法律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问题，需要刑事诉讼立法予以回应；电子证据的审查判断规则也应纳入立法考量。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以《拼图抑或印证：中国刑事法官事实认定的实践检视》为题，认为我国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并存。在没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是“拼图模式”；在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一部分采用“拼图模式”对在案事实进行论证，另一部分采用“印证+拼图”的综合性证据使用模式，即通过印证来解决争议证据信息指向的一致性问题的，通过“拼图模式”来确保在案证据能够涵盖案件的要件事实。从长远看，需要打造更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模式，并进行相关理论构建。

第三单元主题发言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二级调研员王庆刚主持。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闵春雷，以《刑事诉讼证明的体系化思考》为题，认为应以司法证明为核心，确认证明的目的，细化证明要素，并在立法层面淡化印证证明这种单一模式，提倡多种证明方法。随着刑事诉讼发展以及立法日益完善，以刑事司法证明为中心，将证据制度改革逐步拓展至其他裁判领域。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潘金贵，以《刑诉法再修改应当完善辩方证明制度》为题，指出完善辩方证明制度是刑事诉讼法本次修改中应当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针对完善辩方证明制度的必要性、辩方承担证明责任情形、辩方承担证明责任的相应证明标准、辩方证明的相关配套制度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四单元主题发言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褚福民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孙远，以《刑诉法再修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为题，从程序角度切入，讨论



了非法证据排除实体规则完善问题，指出应将证据合法性审查视为一种程序性裁判，使其在具备明确的审判对象和请求权基础的前提下有效运转。应从根本上否定“瑕疵证据”这一概念，厘清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一种程序性裁判所特有的方法论，以实现法庭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质化。

重庆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杨焘，以《非法实物证据补救的实证分析与检视》为题，认为就刑事诉讼立法现状而言，非法实物证据补救问题在必要性与补救方式等方面尚未在理论上得到明确，司法实践中对实物证据进行补救的效果并不理想。应从“合理解释”的规制出发，明确合理解释的对象、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化、确立合理解释标准，以实现非法实物证据补救制度的完善。

张中以《刑诉法再修改与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构建》为题，指出鉴真规则的核心在于实物证据的同一性证明，作为证据可采性审查的先决条件，借鉴国外辨认鉴真规则，对我国实物证据同一性的证明程序完善具有重大意义。庭前会议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立，为我国实物证据辨认鉴真提供了制度空间。应从鉴真标准、鉴真程序、保管链条三个方面，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辨认鉴真规则。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鉴定问题》为题，指出刑事鉴定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当事人补充鉴定与重新鉴定申请权、鉴定人出庭及其与有专门知识的人之间的关系、司法鉴定相关行政规定与刑诉法之间的衔接，均是我国现行刑事鉴定制度

存在的不完善之处。对此，应进一步明确刑事司法鉴定的对象与目的，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问题。



新法速递

# 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司发通〔2024〕3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委员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察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外事办公室、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

为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维护国家司法主权，规范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层报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外交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2024 年 4 月 22 日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司法主权，规范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外联系机关收到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后，应当及时对请求书及所附材料进行审查。审查事项包括：

（一）请求书是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定应当载明的事项；

（二）请求是否依据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者互惠原则等提出；依据互惠原则提出请求的，请求书是否附有由请求国适格主体作出的具体明确的互惠承诺；

（三）请求书及所附材料是否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或者条约规定的译文；

（四）其他需要审查的事项。

前款第二项所指的互惠承诺，应当由请求国外代表机构或者负责国际司法合作的中央层级机关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承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提出的类似请求将提供同等协助，并不得额外增加条件或者进行限制。

对外联系机关收到主管机关拟向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后，参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对请求书及所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及时对外提出。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负有协助送达的义务，是指对于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接受讯问或者作为被告人出庭的传票，主管机关有权决定是否协助送达。

第四条 对外联系机关经审查认为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形式和内容符合要求的，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职责分工，综合考虑请求事项性质、案件所处诉讼阶段等因素确定主管机关：

（一）外国请求协助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案件尚未进入审判阶段的，转交调查、侦查或者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已进入审判阶段的，转交审判机关办理；

（二）外国请求协助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的，依照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转交相关主管机关办理；

（三）案件较为复杂、请求事项存在特殊情形或者涉及多个主管机关，需要明确转交的主管机关的，对外联系机关可以与相关主管机关协商确定主管机关。

第五条 对外联系机关审查认为外国请求书或者所附材料的形式和内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将请求书退回并书面说明理由，同时要求请求国重新提出请求：

（一）请求书存在重大表述错误、影响请求执行的；

（二）请求书未经适当签署或者盖章的；

（三）请求提出主体和请求对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条约规定的；

（四）请求书存在其他严重影响请求执行的情形。

对外联系机关审查认为请求书或者所附材料的形式和内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要求请求国补充材料：

（一）请求书或者所附材料关于案件事实或者请求事项的表述不充分、不清晰，可能影响请求执行的；

（二）请求书或者所附材料未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条约规定的译文或者译文不准确，无法确定请求内容的；

（三）其他需要补充材料的情形。

主管机关审查认为应当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协助，或者存在其他形式或内容不符合要求情形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通过对外联系机关回复请求国。

第六条 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对外联系机关、主管机关和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优先处理：

（一）需要紧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的；

（二）基于调查、侦查、起诉或者审理期限限制，确有必要紧急处理的；

（三）涉及的案件具有重大影响或者其他特殊情形的。

第七条 对外联系机关应当在收到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或者主管机关执行结果之日起 45 日内处理完毕；按照本规定第六条优先处理的，一般应当在收到请求或者执行结果之日起 30 日内处理完毕；需要采取紧急冻结等措施的，应当在收到请求或者执行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处理完毕。

主管机关应当在收到对外联系机关转交的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或者办案机关执行结果之日起 45 日内处理完毕；按照本规定第六条优先处理的，一般应当在收到请求或者执行结果之日起 30 日内处理完毕；需要采取紧急冻结等措施的，应当在收到请求或者执行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处理完毕。

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主管机关交办的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之日起 90 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或者执行完毕；按照本规定第六条优先处理的，一般应当在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或者执行完毕；需要采取紧急冻结等措施的，应当在收到请求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或者执行完毕。

办案机关办理具有跨国因素的刑事案件需要外国提供司法协助的，应当及时起草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并附相关材料报所属主



管机关审核。主管机关和对外联系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处理办案机关向外国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案件重大复杂需要协调处理的，可以不受本条规定的时限限制，但对外联系机关、主管机关、办案机关相互沟通时应当作出相应说明。

第八条 对外联系机关应当加强与外国有关机关沟通联系，推动外国提高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效率和质量。

对外联系机关和主管机关支持、指导办案机关对外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对外联系机关应当定期统计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向主管机关通报。

第九条 主管机关应当对办案机关应外国刑事司法协助请求调取的证据或者其他信息严格审核把关，确保交由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提供的证据或者其他信息在内容和形式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第十条 对外联系机关、主管机关等应当共同推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信息化建设，提高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信息化水平。

第十一条 外国机构、组织、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以下行为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

（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送达传票、通知书、起诉书、判决书或者其他刑事法律文书；

（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收集、调取刑事证据材料；

（三）联系、安排、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赴境外或者在境内通过视频、音频等远程方式作证、协助调查或者参加庭审；

（四）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在境内协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等措施；

（五）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协助执行外国作出的刑事司法裁判；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刑事诉讼活动。

第十二条 建立由刑事司法协助对外联系机关和主管机关等组成的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以下简称工作机制），统筹负责刑事证据出境安全审查相关工作。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收到外国非经国际刑事司法执法合作途径，直接要求其协助进行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刑事诉讼活动或者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定的其他协助的通知的，应当在收到之日起 30 日内，向工作机制办公室书面报告有关情况。

报告时应当提交有关情况的具体说明，并附相关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其他证明材料。报告人要求保密的，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为其保密。

工作机制办公室收到报告后，应当与机制成员单位会商，需要外国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由相关对外联系机关向外国提出要求。

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为维护自身权益等目的，需要主动向外国提供证据的，应当遵守保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有关法律规定，并向工作机制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申请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的身份信息、案件基本情况、申请提供证据的范围、内容和理由等；

（二）申请人如有行政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

（三）关于证据符合保守国家秘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等事项的说明；

（四）关于证据目的、用途以及保密和安全保护措施等事项的说明；

（五）申请所需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工作机制办公室对符合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申请应当及时受理，并会同工作机制成员单位中的主管机关等对申请出境证据进行审查。

工作机制办公室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告知申请人审查结果。案件情况复杂或者需要征求其他有关部门意见的，可以视情延长审查时限。

第十六条 外国请求协助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的，根据案件性质和所处的诉讼阶段，转交相应主管机关办理。主管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安排办案机关依法予以执行，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将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情况通过主管机关告知对外联系机关。

第十七条 外国请求协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已经提供外国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没收令等法律文书副本的，转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办理。经审查符合执行条件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转交相关所属办案机关协助执行。

外国以没收位于其国内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为目的请求提供刑事司法协助，主管机关、办案机关认为相关财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财产的，应当在提供协助时依法请求外国返还。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对等互惠原则与外国开展被没收财产分享合作。对外联系机关会同主管机关可以与外国签订个案分享协议。

外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的没收裁判提供协助并依法提出分享请求的，对外联系机关会同主管机关可以决定与外国分享。向外国分享的财产应当是优先考虑返还财产合法所有人或者赔偿被害人并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案机关的合理费用后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向外国分享被没收财产的比例按照外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没收裁判的贡献程度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外国协助没收、返还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外国提出分享请求的，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作出没收裁判提供协助并依法向外国提出分享请求的，对外联系机关会同主管机关与外国协商确定分享的数额、比例和财产的移交方式。

第十九条 外国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和办案机关应当严格遵守对外作出的量刑、追诉、权利保障、保密、证据用途、适用案件和人员范围等方面的承诺。

第二十条 主管机关收到对外联系机关转交的外国提出的移管被判刑人请求后，应当根据法律和条约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征求相关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主管机关应当在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基础上，作出同意或者拒绝向外国移管被判刑人的决定，同意向外国移管被判刑人的，由对外联系机关书面通知请求国和被判刑人。

第二十二条 对外联系机关可以要求请求国提供被判刑人移管回国后的刑罚执行情况及被判刑人表现，并及时通报主管机关和相关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中有关期限规定的“日”是指自然日。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对外联系机关包括依法应当通过外交途径联系时的联系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四部门印发《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完善执法司法部门配合制约机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执法司法实践，制定本意见。

### 一、总体要求

1. 坚持零容忍要求，依法从严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加大查处力度，坚持应移尽移、当捕则捕、该诉则诉，严格控制缓刑适用，加大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完善全链条打击、全方位追责体系。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严”的主基调，依法认定从宽情节，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 加强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要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强化证券期货刑事案件的移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不断强化证据和程序意识，有效加强法律监督，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坚持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用，将依法办案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相结合，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3. 凝聚执法司法共识，提升专业化水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证券期货监管机构通过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联合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明确执法办案标准和政策把握尺度，统一法律理解与适用。优化机构设置，加强办案基地、审判基地

建设，充实一线办案力量。加强执法司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

##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4. 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移送案件时应当附有以下材料：移送书、涉案物品清单以及证据材料，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市场禁入决定的，应当附有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等。同时，应当将移送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禁入决定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移送案件活动实施监督。

5. 公安机关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移送的案件，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立案。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或者书面通知立案的，应当在要求的期限内立案。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可以申请复议，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和侦查活动实施监督。

6. 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人民法院判决无罪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有证据证明存在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根据证券期货法律法规需要给予涉案人员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市场禁入等处理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判决的一个月内提出意见并附生效法律文书、证据材料、处理根据，按照下列情形移送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处理：

（1）案件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移送公安部的，由地方公安机关层报公安部移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处理，或

者由地方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移送原负责相关案件调查的证券期货监管机构依法处理。

（2）案件系省级及以下公安机关自行受理的，由省级公安机关，或者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移送本地证券期货监管机构依法处理。

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应当将处理情况及时向移送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书面通报并附相关法律文书。

### 三、刑事案件的管辖

7. 证券期货犯罪的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提起公诉，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

8. 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发生争议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9. 证券期货犯罪的犯罪地，包括以下情形：证券期货账户及保证金账户开立地；交易申报指令发出地、撮合成交地；交易资金划转指令发出地；交易证券期货品种挂牌上市的证券期货交易所所在地、登记结算机构所在地；交易指令、内幕信息的传出地、接收地；隐瞒重要事实或者虚假的发行文件、财务会计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的虚假信息编制地、文件编写和申报地、注册审核地，不按规定披露信息的隐瞒行为发生地；犯罪所得的实际取

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承担资产评估、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等职责的中介组织提供中介服务所在地。

10. 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单位登记的住所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11.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12. 上级公安机关指定下级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该案件的公安机关提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同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指定审判管辖或者移送其他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13. 充分发挥办案基地、审判基地专业化办案优势。加大向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交办案件的力度，依法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适当集中管辖。对于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司法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原则上指定办案基地、审判基



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侦查、起诉、审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办案基地、审判基地所在地一致的，适当简化各环节指定管辖的办理手续，加快办理进度。

#### 四、证据的收集、审查与运用

14. 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专业、隐蔽的特征，为揭露证实违法犯罪，对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做到“应收集尽收集、尽早收集”。在侦查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其他罪行的，除依法移交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以外，应当一并进行全面侦查取证。

15. 注重收集提取物证、书证、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遵守法定程序、遵循有关技术标准，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证券交易场所、期货交易场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期货保证金监控机构以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留存的证券期货委托记录、交易记录、交易终端设备信息和登记存管结算资料等电子数据，调取时应当以电子光盘或者其他载体复制原始数据，附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完整性校验值等说明，并由制作人和原始电子数据持有人签名或盖章。

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证券期货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的信息披露公告，其打印件或者据此制作的电子光盘、其他载体，经核对无误并附来源、制作人、制作时间、制作地点等说明的，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16. 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在行政执法中，虽未能调取到直接证明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的证据，但其他证据高度关联、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的，可以根据明显优势证据标准综合认定违法事实。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办理涉众型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言词证据的，可以根据已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客观证据、言词证据，综合认定资金数额、损失数额等犯罪事实。

17.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材料，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18.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就案件涉及的证券期货专业问题，商请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出具专业认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证券期货监管机构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主要事实和证据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参考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定意见。

出具专业认定意见不是办理证券期货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没有专业认定意见的，不影响案件的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判决。

## 五、坚持依法从严打击

19. 深刻认识证券期货犯罪对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安全的严重危害，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对具有不如实供述罪行或者以各种方式阻碍办案工作，拒不退缴赃款赃物或者将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非法获利特别巨大，多次实施证券期货违法犯罪，造成上市公司退市、投资人遭受重大损失、可能引发金融风险、严重危害金融安全等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危害后果等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适用相对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和缓刑。

20. 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财务造假、侵占上市公司资产、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等违法犯罪案件。证券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金融从业人员等实施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全链条打击为财务造假行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金融票证等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为内幕交易、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实施配资、操盘、荐股等配合行为的职业团伙，与上市公司内外勾结掏空公司资产的外部人员，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 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对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退赃退赔、真诚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罚；符合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范围和条件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依法认定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不得降低认定标准。

22. 加大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要注重自由刑与财产刑、追缴违法所得并用，加大对证券期货犯罪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财产执行力度。人民检察

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依法提出从业禁止建议，作出从业禁止决定。

## 六、完善协作配合机制

23. 完善办案协作机制。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和公安机关对于可能涉嫌证券期货犯罪线索，可以通过联合情报导侦方式，综合运用数据资源和信息化手段，协同开展行政调查和刑事核查活动。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根据办案需要并依法履行相关手续，查询涉案证券期货账户交易信息、相关人员的户籍和出入境等涉案信息，调取案件材料，以及商请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代为送达法律文书、代为询问，咨询专业性问题的，应当依法互相协助。

24. 建立健全信息通报机制。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加强配合协同，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依法及时通报案件移送、办理信息及协作需求，依托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技术，开展资源整合共享，合力提高办案质效。

25. 建立健全执法司法联合专项行动机制。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开展联合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重点环节、新兴领域、高发类型等违法犯罪活动；联合挂牌督办大案要案，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发挥震慑作用。

26. 建立健全工作会商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建立不同层级的会商制度，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适用、证明标准等争议问题，消除工作配合制约过程中的分歧；分析研判违法犯罪态势，提出治理对策，共同提高工作质效。

27.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8.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健全办案机构，加强办案力量，加大办案工作力度。要加强证券期货犯罪工作公安、司法队伍专业化建设，鼓励、支持省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辖区内专业办案能力建设和培养，充分发挥办案基地、审判基地示范效应。通过联合调研、联合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与尺度，提高办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的能力和水平。

## 七、附则

29.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本意见。

30. 本意见所指的证券期货犯罪，包括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九条（仅限涉及证券期货业务）规定的犯罪。

31.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1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证监发〔2011〕30 号）同时废止。





# 刑辩 实务研究

## 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涉工程建设领域黑恶犯罪 典型案例

### 案例一 虞某荣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犯罪 组织成员 诉源治理

####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浙江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人虞某荣，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被告人戴某松，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王某成，浙江省某水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吴某龙，浙江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其他 64 名涉案人员及单位基本情况略。

1995 年，被告人虞某荣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997 年刑满释放后，虞某荣先后结识了被告人吴某龙、王某成等人。2002 年以来，虞某荣、王某成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戴某松、高某昌、杨某江、来某维、华某平等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2009 年 9 月，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强迫杭州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份，强行入股某房产项目，非法获利 4180 万元，在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确立强势地位。后虞某荣、戴某松成立杭州

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土方、市政等工程领域，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在工程、土方领域建立非法秩序，攫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了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与此同时，自 2001 年以来，被告人吴某龙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来某东、汤某云等人，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2009 年 12 月，吴某龙组织的来某东加入以虞某荣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2014 年 7 月以来，为取得工程土方项目，吴某龙与虞某荣、戴某松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实施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吴某龙手下汤某云亦受虞某荣、戴某松指使实施串通投标犯罪行为，两股势力相互勾结、融合，以经济利益和工程项目为纽带，发展扩大成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吴某龙为组织者、领导者，下有骨干成员 10 人、积极参加者 17 人、一般参加者 35 人的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层次分明，实行分层管理，以暴力为后盾排挤、打击竞争对手，“以黑护商”，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该组织“以商养黑”，将攫取的利益用于豢养组织成员，并为组织成员购买车辆、偿还赌债，为支持成员犯罪购买作案工具、提供逃匿经费、出资赔偿、摆平事端、提供治疗费用、安抚善后等，还组织成员聚会、娱乐、吸毒，通过安排组织成员承揽工程分配利益、笼络人心，并拉拢、腐蚀相关国家工作人员，以此维持组织的运行、发展。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实施了走私武器、寻衅滋事、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敲诈勒索、聚众斗殴、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强迫交易、串通投标、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事实 170 余起，涉案金额高达 40 余亿元，造成 14 人轻伤、8 人轻微伤等严重后果。为谋求庇护，该组织多次行贿，拉拢、腐蚀相关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金额合计 700 余万元，为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非法保护。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大量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控制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的土方、市政绿化、土建等工程，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采取暴力、“软暴力”手段，非法逼讨债务，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对当地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严重扰乱当地社会生活秩序；实施骗取贷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行为，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严重扰乱当地经济秩序。该组织还通过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庇护，使其逃避打击，坐大成势，严重破坏了政府公信力和司法公正。

本案由浙江省公安厅于 2018 年 5 月 7 日立案，同日指定东阳市公安局侦查。该案虞某荣等 14 名被告人（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及 5 个被告单位涉黑一案由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余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所涉案件由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9 年 7 月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9 年 12 月 24 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走私武器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无期徒刑、二十五年至八年不等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涉

黑案的积极参加者、一般参加者由东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的刑罚。判决后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指控和证明犯罪】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吴某龙等人组成的犯罪组织符合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难点问题集中在如何区分组织犯罪与个人犯罪、如何认定组织成员是否脱离组织等方面。

（一）依法准确区分组织犯罪和个人犯罪。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一为组织成员来某维、童某才、徐某等人 2012 年在被虞某荣安排到老挝波乔省金三角经济特区金木棉赌场帮忙期间，购买手枪携带回国并持有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行为。经审查认为，骨干成员来某维走私、购买枪支，骨干成员华某平非法持有枪支，组织成员童某才走私枪支均应认定系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理由有二：一是上述成员持枪行为均系在从事组织安排的任务期间实施的行为。虽然组织者、领导者虞某荣等人供述对上述行为事先不知情，但虞某荣等组织者、领导者一贯以来对于成员买卖、持有枪支持默许态度。虞某荣自己在老挝金三角地区私藏大量枪支，并在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过程中使用过枪支，而虞某荣亦知道骨干成员来某维等人收集、把玩枪支，并将来某维走私入境的枪支要来自己把玩，因此其对来某维走私、持有枪支并用于该组织实施的其他犯罪持默许态度。二是涉案枪支被用于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对扩大组织的影响力，确立强势地位起



到重要作用。虞某荣等人默许来某维等组织成员持枪的心态，贯穿于整个组织发展过程中，助长了组织成员好勇斗狠的心理；华某平作为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实施暴力性犯罪的关键成员，其持有枪支并由手下对外宣扬，对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排除竞争对手、确立强势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致使他人不敢在土方、市政、土建等工程领域对抗虞某荣，客观上提高了组织的威慑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如 2014 年童某才、徐某等人在虞某荣的帮助下为争夺土方工程项目，与他人发生聚众斗殴，使用从境外走私的枪支造成他人受伤。因此，组织成员实施的走私、持有枪支行为应当认定为该组织实施的犯罪。

（二）审慎甄别组织成员，依法认定组织成员是否脱离黑社会性质组织。该案控辩争议焦点之二为被告人徐某、童某才等人是否脱离组织。审判过程中，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来某维及各辩护人辩称，徐某因在老挝金木棉赌场管理中有不当行为被虞某荣安排回国后，双方已无任何关系，之后徐某的行为与虞某荣无关；作为徐某手下的童某才也非组织成员。经审查认为，组织成员徐某、童某才并未脱离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脱离、退出黑社会性质组织要结合主客观两个方面综合认定，主观上看是否有脱离、退出组织的意愿和意思表示；客观上看是否不再参与组织活动、不再与组织成员保持联络、不再接受组织豢养、不再服从组织安排、调遣等。本案中，徐某从老挝回国之后在行为上并未和虞某荣团伙脱离联系，主观上徐某和虞某荣也都未认为相互之间已经脱离关系。在 2012 年砍伤陈某祥案件发生以后，虞某荣安排徐某到老挝为其管理境外赌博生意，但徐某未服从虞某荣的安排擅自从老挝回国，2014 年因为与他人争抢土方工程寻求虞某荣

帮助，并与其他人聚众斗殴，后因此事坐牢，在此期间，虞某荣对徐某及其家人多方关照。一直到本案案发前，徐某一直作为虞某荣的“小弟”为其做事，并未脱离组织。童某才在老挝金木棉赌场期间作为徐某的“小弟”，负责联系赌场公关部帮助赌客偷渡出入境、带客人赌博时兑换筹码等工作，在 2014 年抢夺土方工程时，伙同徐某与其他人聚众斗殴，对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故现有证据证明童某才在主观上和客观行为上并未与组织脱离关系，徐某、童某才均系组织成员。

（三）依法区别处理，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虞某荣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中，参与同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串通投标的单位有浙江某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 14 家单位以及沈某良等 48 名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在杭州市滨江区的市政、园林绿化、土建等工程领域，自己或帮助他人采用收买公司、通过统一排标定价操控中标价格的方式，组织、纠集或参与围标 71 个工程，围标次数从 1 起到 46 起不等，工程总标的额超过 60 亿元，非法获利数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检察机关对这些企业和个人，一是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案人员及单位进行分类处理。经审查认为，上述企业均为工程建设领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与以虞某荣等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关系并不紧密，没有为该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经济支撑，仅仅因迫于该组织在土方工程领域的垄断地位，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或被裹挟参与围标，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同时，根据在串通投标过程中的作用，将涉案人员、单位划分为组织者、纠集者、参与者，对以串通投标作为主要牟利手段和获利方式的组织者从严处理，依法

对沈某良及某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等 17 名围标组织者提起公诉；对被动参与串通投标的部分纠集者和一般参与者，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作出轻缓处理，对 30 名个人及 6 家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对部分提起公诉的提出轻缓量刑建议。二是制发刑事合规检察建议书，督促完善企业治理。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将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纳入认罪认罚量刑考量，积极探索引导 6 家涉嫌串通投标但犯罪情节轻微且认罪认罚的建设施工企业，进行初步合规制度建设，在评估其社会危害性和再犯可能性基础上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宣布不起诉决定后，为督促、引导涉案企业深化开展专项合规建设，向上述企业制发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书，委托第三方组织对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情况进行考察，企业专项合规建设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涉案上述企业规范经营，经济效益得到稳步提升。结合建设施工企业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违法风险点，检察机关联合市发改局、公安局、住建局、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等多部门共同出台《建设施工企业投标合规指南》，引导建设施工企业加强投标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诉源治理，促进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 【典型意义】

（一）依法惩治工程建设领域黑社会性质组织。黑恶势力在工程建设领域非法控制、垄断土方土建、市政绿化等工程，衍生围标串标、违法转分包、行受贿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行为人依托公司等经济实体，以经济利益和工程项目为纽带形成人数较多、成员固定、层级分明、结构严密的犯罪团伙，以暴力为后盾排挤、打击竞争对手，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串通投标、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干扰百姓正常生产生活，对群众造成心理强制、威慑，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可以依法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妥善处理涉企案件。对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垄断地位、重大影响，被裹挟参与围标的涉案企业，或为赚取围标费、管理费参与投标、陪标的其他企业人员，并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对该类企业和人员要根据在串通投标过程中的作用，准确审慎区分处理，依法作出不起诉、提起公诉或者从宽处理。

## 案例二 曾某雄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 【关键词】

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成员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 【基本案情】

被告人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曾某雄，男，56 岁，广东省五华县某实业有限公司、五华县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五华县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等远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被告人曾甲（曾某雄次子）、曾乙（曾某雄长子）、李某东（曾某雄外甥）等其他 25 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 世纪 90 年代，曾某雄及其家族成员开始涉足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建筑行业，参与当地一些工程项目建设。2003 年，曾某雄为争夺五华县水寨镇工业园（系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总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里，落地企业近百家）工程项目，殴打工程老板廖某某致其轻伤，迫使其放弃该项目。曾某雄因此事被判刑，但其在缓刑考验期间，为控制工业园工程，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2005 年，为推进工业园的项目施工，曾某雄纠集曾乙等人持械殴打进行土地维权的周某茂、曾甲辉等村民，造成曾甲辉重伤、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该案中曾某雄方未受到任何处理，周某茂方因其他案件被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自此，曾某雄犯罪团伙在该工业园及周边地区取得强势地位并树立非法权威，以曾某雄为组织者、领导者，曾乙、曾某雄外甥李某东、包甲明、包乙明等人为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此后该组织利用非法影响力继续在工业园区强揽工程牟利，不断发展壮大。曾某雄次子曾甲因犯抢夺罪被判刑，于 2010 年 2 月刑满释放后，协助曾某雄管理工程项目，依托其父亲曾某雄出资和前期形成的非法影响力，先后成立五华县某大酒店有限公司（外挂商号某酒吧）等企业，并以该酒吧等为聚集地，纠集曾某祥、李某等 18 名有前科、吸毒劣迹的社会闲散人员，实施了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其间，曾某雄为攫取更大经济利益陆续成立五华县某实业有限公司、五华县某建设有限公司等 18 家远信系公司，均由其家族成员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该组织成员大多在某酒吧担任内保或者在远信系其他公司任职，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管理。该组织利用其非法影响力以及暴力威胁手段承揽工业园的厂房建设、土



石方、混凝土、爆破等工程牟取暴利，并将所获经济利益用于组织成员福利、娱乐、购买作案工具等以维系组织的生存、发展。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和扣押了涉案银行资金、保险理财产品等约 1900 万元，依法对 116 处不动产和 166 辆汽车、重型工程车等限制交易，对未结清工程款约 1.79 亿元进行截留。

该组织长期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欺压残害百姓，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 19 起犯罪行为及大量违法活动，造成 2 人重伤、11 人轻伤及多名群众受伤的严重后果；在多个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以暴力为依托，组织多名成员到施工现场站场造势，强行施工。

该组织通过实施前述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在工业园周边地区取得强势地位并树立非法威信，非法控制了工业园的大部分厂房建设、土石方、混凝土、爆破等工程，以致其他人在工业园做上述工程需要经过该组织同意或者跟该组织打招呼；对工业园及周边地区的群众形成心理威慑，致使众多违法犯罪活动的被害人及相关群众不敢举报、控告，对当地工程建设形成非法控制，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如 2012 年，被害人李某希、李甲明获得工业园内铺设燃气管道的工程后，惧于曾某雄等人的势力，特意登门拜访曾某雄征得同意后才敢开始施工，但刚施工即被曾甲逼迫，不得已将该工程让予曾甲。工业园内的公司如想使用其他公司供应的混凝土，须事先跟远信系公司打招呼征得曾某雄同意后方能入场，否则会受到恐吓、干扰。

在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期间，为壮大产业、谋取更多利益，曾某雄、曾乙在未取得合法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通过挖毁、填埋林地及混凝土硬底化、兴建建筑物等方式，逐步对涉案农用

地进行开发建设，造成涉案农用地原有耕作层、山体排水系统被毁坏，原有种植条件和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

本案由梅州市公安局、五华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梅州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移送平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平远县人民检察院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向平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的刑事被告人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年 10 月 27 日，平远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犯罪，判处组织者、领导者曾某雄、曾甲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六年八个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财产刑；判决曾某雄、曾乙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 1200 余万元，承担鉴定评估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曾某雄、曾甲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2023 年 4 月 23 日，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依法认定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是否将曾某雄和曾甲、曾乙父子三人纳入同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处理。该父子三人早年分家，因曾某雄重婚等原因，父子感情存有隔阂；该组织所涉公司形式上相互独立，分别由三人各自经营，三人名下公司业务范围不同，各公司有独立的财务制度。通过审查分析其内在联系，检察机关认为应当纳入同一组织处理，理由如下：

一是有共同的家族利益。三人基于父子关系共同维护家族利益。曾某雄作为家族的核心，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为曾甲和曾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三人对外分工协作共同壮大家族势力。如在组织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员瑾村聚众斗殴案中，曾某雄为推进土方工程，纠集儿子曾乙、外甥李某东、包乙明等持械与对方斗殴，由此曾某雄及其家族成员在工业园区建立起强势地位。此后，曾某雄为攫取更大经济利益成立的远信系公司，也多由其儿子曾乙、曾甲、外甥李某东、李乙明挂名或参加管理，其外甥包乙明也利用某系公司非法影响力经商，反映出其内部是以家族血亲关系维系共同利益。在曾甲、曾乙等人组织多名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或插手他人纠纷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均由曾某雄出面帮助解决善后、予以资金支持和协调关系，帮助曾甲等人逃避惩罚。

二是有共同的组织经济利益。曾甲、曾乙名下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主要依靠曾某雄及组织的非法影响力。一方面，曾甲和曾乙名下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曾某雄；另一方面，三人名下公司虽业务范围不同，却存在密切联系。曾某雄通过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力承揽工程，垄断民用爆炸品，从而顺利垄断工业园区的土石方工程，而曾甲、曾乙名下公司也顺理成章地承揽了相关的厂房建设、混凝土供应业务，三人名下公司实现共同受益。如 2017 年五华县冠华城建设，原承建公司因施工受阻挠，业主只能找曾某雄处理，曾某雄顺利接手该工程，后主体工程、站场、混凝土等分别由曾某雄、曾甲、曾乙负责，父子三人在组织威力庇佑下共同获利。

三是有共同的暴力支持。曾甲的某酒吧豢养了一批内保，由曾甲领导和管理，他们除为了曾甲名下公司利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外，也为曾某雄、曾乙名下公司强揽工程、排除妨碍顺利施工等提供暴力支持。如曾某雄公司承包水寨镇黄狮新村安置区工程，为防止有人维权闹事，曾甲安排内保人员曾某源等人到场站场造势，保障工程顺利进行。2015年曾某雄控制的某爆破公司在碧桂园二期施工过程中遇到村民阻挠，曾乙、曾甲得知消息后召集多人在某酒吧商议，并于次日纠集上百人到施工现场殴打被害人李某芳等人，用铁锤等工具砸毁李某芳家大门，冲入住宅后肆意毁坏门窗，造成1人轻伤，2人轻微伤。

（二）严格甄别，依法认定涉案公司员工是否属于组织成员。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涉案公司员工能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该案不少涉案人员受聘在远信系公司任职，领取的工资并不高，公司对其管理比较松散，这部分人员有的相互之间不认识，有的甚至不认识曾某雄、曾甲等组织者、领导者，仅或多或少地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存在争议。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

一是对主观上知道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重要内容，且多次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依法认定为组织成员。如本案被告人李某认为其协助曾甲管理某酒吧是正常经营行为，其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在案证据证实，某酒吧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聚集地，也是该组织内保人员发放工资、娱乐、提供作案工具的场所，李某作为某酒吧经营管理者之一，对某酒吧员工的主要活动非常清楚，在管理员工过程中也起到主要

作用；其明知曾甲多次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跟随曾甲参与与酒吧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明知事后该组织会出面兜底，故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被告人曾某源、曾乙辉、李某阳等作为某系公司工作人员，虽领取的工资不高，但入职公司的时间较长，多次参加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二是对参与组织行为次数少、情节轻微的，不应认定为组织成员。如公司员工李乙明系曾某雄外甥，但其只是某实业有限公司、某劳务有限公司显名股东之一，仅在 2005 年参加员瑾村聚众斗殴案，此后未参与该组织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故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酒吧保安戴某强、戴某等人，虽然接受被告人李某管理，但仅参与了个别情节轻微的站场活动，领取正常的工资，没有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愿，认定为个案共犯或者参加者，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三）全面挽损，依法准确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该案中，曾某雄、曾乙非法占用五华县水寨镇员瑾村鸡鸣山地块，并损毁地块总面积 34 万余平方米，损毁农用地面积 32 万余平方米，损毁程度属重度损毁类型，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同时，针对生态环境受损未得到修复等情况，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诉请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977.45 万元、截至 2022 年 5 月底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 150.54 万元，并从 2022 年 6 月 1 日起，以每年增加 75.96 万元为标准，赔偿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支付到位为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将由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启动生态修复工作前所必须经历的起诉、判决、执行等



诉讼程序期间，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持续计算时间。上述全部诉讼请求均获法院采纳支持。

### 【典型意义】

（一）围绕四个特征认定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家族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不仅要看家族成员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利益，更应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四个特征，综合分析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家族成员间的分工、联系与协作支持等方面情况，进而明确是否同属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家族成员之间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暴力行为和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交融，对外形成合一的组织影响力，应当认定为同一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依法区别处理涉黑组织开办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者、领导者所开办公司工作的人员，应结合其主观认识、地位、作用和客观行为综合分析、区别处理。在组织开办的公司中工作的人员，对组织的恶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和规约有一定认知，多次参与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较为重大的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对主要通过提供正常的劳务、投资等方式获取报酬，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较少或者情节轻微的人员，不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 案例三 周甲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 【关键词】

黑社会性质组织 组织成员 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 诉源治理

#### 【基本案情】

被告人周甲，男，38 岁，湖南长沙某环保物流有限公司股东，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因殴打、威胁他人被行政处罚。

被告人周乙，男，35 岁，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股东，曾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威胁、恐吓他人被行政处罚。

其他 21 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周甲、周乙两兄弟以家族关系为纽带，以经济利益笼络部分社会闲散人员以及个别公职人员，采取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现湘江新区）洋湖片区一带打压行业竞争对手、阻挠行政机关执法、强揽项目建设土方工程，并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21 起，逐渐形成以周甲、周乙为组织者、领导者，李某杰、莫某等为骨干成员，刘某宇、阳某民等人为积极参加者，刘某文、刘某昌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为坐大成势、称霸一方，该组织惯于“以黑护商”“以商养黑”。周甲先后于 2015 年 8 月和 2018 年 10 月成立长沙某环保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和长沙某砂石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以公司形式管理组织成员，将相关组织成员“变身”为公司股东、高管或安排在公司任职，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管控组织成员和分配红利、支付薪酬，并为受到打击处理的组织成员“接风洗尘”“红包慰问”，形成了听从指挥、随叫随到、有事汇报、出事由组织“摆平”等行事惯例。为把控当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业务，该组织以环保物

流、渣土运输等公司为幌子实施犯罪攫取“黑财”，仅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犯罪涉案金额就高达 3000 余万元、违法所得 590 余万元；案发后，扣押涉案车辆 11 辆，查封房屋 26 套，冻结银行账户 46 个、账户金额共计 1750 余万元，冻结股权价值 1150 万元。

为逃避打击、长期存续，该组织主要通过聚众造势、语言威胁、堵门阻工等“软暴力”行为，以“谈判”“协商”“调解”等方式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强制和威慑，逼迫他人退出已承揽的工程项目，强行入股他人承揽的工程项目，或者在承揽工程项目后故意拖延工期且拒不退场，故意制造“僵局”迫使项目方将后续项目继续交由其承揽。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洋湖生态新城出让地块的建设或在建工程项目 17 个，周甲、周乙等人参与商业项目土方工程 9 个，占洋湖新城项目总数的 53%，其中有 6 个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揽所得，3 个利用组织“威名”承揽所得，另对其他 2 个商业工程项目实施了堵门、阻工行为，意图强揽项目土方工程，迫使对方支付“退场费”，敲诈勒索他人财物，造成了当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没有周甲、周乙等人的同意或者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个人也不敢来洋湖街道承揽土方工程的非法控制局面。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把控当地土方工程的准入、退出、经营，该组织“软硬兼施”，或以行贿、送礼、分红等方式拉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或殴打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阻挠执法，造成群众和正当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严重干扰、破坏了国家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秩序和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本系列案由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8年9月4日立案侦查。2019年7月2日，长沙市公安局将该案指定宁乡市公安局管辖。同年9月23日，宁乡市公安局以周甲、周乙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移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6月5日向宁乡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7日，宁乡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犯罪，判处周甲、周乙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和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罚；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十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罚。判决后，部分被告人上诉。同年11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指控和证明犯罪】

（一）坚持“不漏不凑”，严格区分涉案人员系商业合作伙伴还是涉黑犯罪组织成员。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在发展壮大以及利用组织“威名”实施违法犯罪过程中，往往设立公司法人，具有合法经营外观，组织者、领导者或其他组织成员经常联合其他单位和个人开展承包经营、合伙承揽工程项目等经济行为，经济交往具有一定复杂性。对其他单位或个人是否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是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检察机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逐一分析涉案人员的主观意愿、服从程度、参与次数、职务分工、获利多少等因素，重点审查：一是涉案人员主观上是否明知。根据涉案人员与涉黑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其他成员的特定关系、交往时间、合作程度等，审查涉案人员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

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二是涉案人员是否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依靠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达到对经济、社会生活进行非法控制、重大影响，并实现攫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于其他犯罪组织的本质特征。涉案人员是否长期、多次参与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与该涉黑组织之间存在关系的重要标志。三是涉案人员是否与涉黑组织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重点审查涉案人员是否和组织者、领导者周甲、周乙二人保持较稳定的分层管理关系，并受该组织的管理和纪律约束。本案中，余某加、赵某德、周丙、刘某等7人以合伙经营或出资入股的形式与周甲、周乙等人共同承揽工程项目，并按照约定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侦查机关认定该7人均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认为，余某加、赵某德等5人均系洋湖街道本地人，明知周甲、周乙等人成立的公司系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在当地土方工程领域业已形成非法权威，为借势谋取不法利益而依附于该组织，合伙承揽工程项目；听从周甲、周乙的指挥、安排，共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并按照事先分工直接参与违法犯罪，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在实施违法犯罪和瓜分违法所得过程中，实际处于被领导、管理、指挥的地位，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周丙、刘某等2人虽主观上也明知周甲、周乙等人系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但与周甲、周乙等人在工程承揽事项以外接触交往较少，参与相关工程建设项目运作、管理的程度不深，在涉案公司任职的相关组织成员并不听从其安排、调配，获利数额与该行业正常投资获利的情况基本相符，所涉犯罪也不属于由周甲、周乙等人主导的违法犯罪，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该二人受该组织纪律规约的约束。同时，周丙在其他地方另外承揽土方工程项目，



有自己独立的施工团队，一定程度上与周甲、周乙存在竞争关系。综合上述情况，检察机关依法未认定周丙、刘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仅对该二人涉嫌的强迫交易犯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分别依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上述指控意见。

（二）依法认定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做到罚当其罪。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为维系运转、豢养成员，需要不断承揽工程建设项目，以攫取源源不断的非法经济利益，达到“以商养黑”目的。一旦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无法承揽工程项目，往往需要借助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强揽。根据刑法第 226 条强迫交易罪的立案标准，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强迫交易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千元以上的，属于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本案中，该组织于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先后实施强迫交易 6 次，涉及金额 3000 余万元，已达到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存有疑问。现有司法解释暂未明确强迫交易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司法办案中对此也认识不一。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认定强迫交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应结合强迫交易次数、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数额、作案手段、持续时间，特别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出整体评价。办案中，重点审查：一是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是能够直观评价其行为严重程度的要素，如个别省份根据实践总结明确了以“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 10 倍以上或者强迫交易 10 次以上作为“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之一。二是犯罪手段恶劣程度。重点审查在强迫交易过程中是否直接使用了暴力、

是否导致他人受伤、是否组织多人实施以及是否长期对他人实施暴力、威胁等。三是破坏市场秩序程度。强迫交易罪作为扰乱市场秩序类犯罪，是否控制当地行业市场或者对市场氛围有重大影响，是衡量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方面。经审查，本案中，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及违法所得数额超“情节严重”标准 1000 倍以上；在相关项目土石方工程中，通过发放“出场费”，煽动当地几十名村民到现场阻工闹事，堵门阻工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致使工程项目进度严重拖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大；实施的 6 次强迫交易犯罪时间跨度长达 5 年，范围涉及洋湖街道多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造成当地土方工程没有该组织同意或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或个人也不敢承揽的非法控制局面。其涉案金额大、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有关“情节特别严重”的指控意见。

（三）依法能动履职，做深做实诉源治理。针对洋湖街道工程建设领域存在的黑恶势力非法排除和限制竞争、干预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单位发出关于进一步优化当地营商环境的检察建议书，督促联合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及时移送违法犯罪线索，并针对性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释明通过堵门阻工、煽动闹事等手段强揽工程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提高辖区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法治意识。同时，检察机关与其他机关开展共建共治，联合公安、人社、住建、民政等 6 部门出台《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促进工程建设领域依法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划分职责范围，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区分对象确定惩治措施，

对违法犯罪企业和个人依法追究行政、刑事责任、列入不良记录档案，对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等七种行为一律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意见》特别强调适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共同打击工程建设领域犯罪，归纳检察机关应当制发检察建议并督促落实的六种情形，督促职能部门尽职履责，从源头上整治行业乱象。

### 【典型意义】

（一）区别处理与黑恶势力有合作关系的单位或人员。对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者、领导者或者骨干成员有投资入股、项目合作、工程承揽等经济关系的人员，是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应当注重审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公司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客观上是否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是否与涉黑组织之间存在相对固定的从属关系。对明知组织“威名”并谋求加入，接受组织领导、管理并形成依附从属关系，长期、多次参与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对明知该组织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但没有加入组织的意愿，仅以签订或正常履行商业合同为交往，基本不参与或仅参与少量违法活动的项目合作方，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按照具体犯罪处理。

（二）以案促治协同发力推动完善扫黑除恶长效机制。检察机关应当坚持以案促治，深刻剖析黑恶势力滋生的原因、规律和社会治理的漏洞，研究对策建议，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构建联动机制等方式，会同主管部门积极参与诉源治理，净化行业生态，构建防范黑恶势力滋长成势的长效机制。

#### 案例四 李某梅等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案

##### 【关键词】

恶势力犯罪集团 拆迁 组织成员 组织犯罪

#####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梅，女，43 岁，山东某路政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曾因盗窃、绑架、贩卖毒品、开设赌场等犯罪，先后 4 次被判刑入狱。

被告人孙某，35 岁，无业。

被告人李某鹏，31 岁，无业。

其他 10 名涉案人员基本情况略。

2016 年 4 月被告人李某梅刑满释放后，通过淄博市临淄区雪宫街道办事处原副主任崔某勇（另案处理）的关系，开始承揽雪宫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拆迁等工程。其利用自身曾多次被打击处理的恶名，纠集、笼络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在 2 年多时间内，实施 6 次故意毁坏财物、5 次寻衅滋事、1 次非法侵入住宅等犯罪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被告人李某梅为首要分子，被告人孙某、李某鹏等人积极参与的“强拆”恶势力犯罪集团。

该犯罪集团成员分工明确，李某梅系总指挥，孙某和李某鹏直接听命于李某梅，另外，还有具体实施破门强拆的“内围人员”以及站场壮势的“外围人员”。被告人李某梅在接到崔某勇的通知后，会召集集团的骨干成员“开会”商量拆迁方案，通过多次

上门滋扰、着黑衣“文身”谈判、电话骚扰、威胁等手段迫使拆迁户屈服。对于未达成协议的拆迁户，纠集多人将其控制后，采用破门侵入、强行搬离、强制架离、殴打等手段达到拆迁目的。如为迫使被害人秦某国同意拆迁，李某梅安排他人将十几条蛇扔到被害人家中，开车跟踪、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拦停被害人，被害人阻拦强拆时，被强行拖出房屋并被殴打致轻微伤。为了笼络骨干成员，李某梅还实施了容留他人吸毒、妨害作证等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案由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李某梅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9年3月18日移送审查起诉。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10月8日以被告人李某梅等人犯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向临淄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2月30日，临淄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某梅等人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犯罪，数罪并罚，判处李某梅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对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五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的财产刑。宣判后，被告人李某梅上诉。2020年2月2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指控与证明犯罪】

（一）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准确把握涉黑恶组织的证据要求。本案因涉及“拆迁”领域，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度高且有涉黑



嫌疑，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派办案组提前介入，紧紧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认定标准，提出针对性引导取证意见，侦诉合力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指控体系。重点审查：一是组织稳定性和严密性是否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性特征的认定标准。经审查，李某梅犯罪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除相对固定的骨干成员外，组织成员多为社会混混、痞子，实施违法犯罪时一般都是李某梅临时开会分配任务，召集骨干人员临时纠集人员参与，部分参与人员系被临时雇佣，并未与李某梅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该组织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无约定俗成的规约、帮规。如在集团实施犯罪过程中，允许骨干成员根据个人时间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有的骨干成员（如常某仲）经常单独自行或纠集其他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二是李某梅等人通过违法犯罪获取的经济利益是否用于豢养组织成员。证据显示，该犯罪集团主要是采取“坐地分赃”方式进行分配，且主要用于个人生活支出，较少用于维持该组织生存和发展。三是暴力性是否达到控制威慑一方的程度。李某梅等人主要实施的是停水停电、砸楼道玻璃、制造噪音滋扰等“软暴力”手段，仅有两起体现出了暴力性，并造成两人轻微伤的危害后果。同时，本案被侵犯的对象多为拆迁范围内的少数拆迁户，相对特定，组织实施的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3 项罪名，系根据强拆对象身份等不同情况而采用的程度不同的犯罪行为。四是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响。李某梅犯罪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集中在少数政府工程且为特定的拆迁辖区，其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牵涉承揽工程之外的其他领域，侵犯的主要是在政府拆迁工程中对于政府的拆迁政策不认可、拒绝搬迁的拆迁户，并未影响除拆迁户之外的其

他人的正常生活，虽然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但未对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造成重大影响。综上，检察机关认为，该组织成员较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相对固定，为获取非法利益，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实施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活动，已达到恶势力“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认定标准且具有犯罪集团特征，但未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认定标准，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二）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事实，做到不枉不纵。本案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李某梅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的所有与工程有关的行为是否均应认定为犯罪行为。该案公安机关移送起诉该犯罪集团实施的 37 笔涉拆迁犯罪事实中，有 14 笔挖沟、挖地槽的事实被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行为。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该犯罪集团参与的部分土方、垃圾清运、拆迁工程，系其与政府签订工程承接协议、被拆迁人员与政府签订赔偿协议后实施的，对于上述拆除、施工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犯罪行为。主要考虑：该行为虽然客观上造成被害人出行不便，逼迫其同意拆迁，但相关工程的负责人和经办人证言，以及李某梅等人供述，均证实该集团成员挖地槽系正常施工行为，其中并无强制拆除、强制搬离、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的违法犯罪行为，且都已经重新接好。以上行为虽客观上确实给被害人造成交通不便，但无法证实犯罪集团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此外，有 12 起事实的被害人称，其签订拆迁协议，是因为李某梅犯罪集团打砸其他拆迁户玻璃后造成了心理恐惧被迫签订协议，但在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且相关事实被告人均未供述，证据不足，无法将该类事实认定为犯罪。对于该犯罪集团在桑家坡、胜

辛生活区、临园生活区等拆迁工地实施的 11 笔犯罪事实，包括 2 起使用消防斧暴力破门或利用铲车破窗进入被害人家中控制被害人后，强制拆除房屋；1 起强行控制被害人不能接近拆迁现场，对被害人房屋强行拆除；4 起通过殴打、拖出被害人后利用拆车、挖掘机强行拆除房屋以及 4 起因被害人阻止强拆，而采取扔蛇恐吓、开车尾随拦停殴打被害人、言语恐吓、开车尾随上访人员制造交通事故滋事等，已造成十余名被害人人身、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拆迁户的正常生活，对多数未搬迁的住户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被迫签订拆迁协议，社会危害性大，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依法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本案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是否将全部参与人员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检察机关首先厘清各个涉案人员参与犯罪集团的时间、参与原因、参与程度、具体行为、有无拉人入伙、个人获利情况等，划分不同层级，避免因“一刀切”认定不当扩大惩治范围。经审查，确定李某梅组织、领导多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确定积极参与集团犯罪活动组织、指挥其他人员实施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寻衅滋事等犯罪的，如李某鹏、刘某俊、孙某、胡某佳等人为第二层级人员，为该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明知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而参加，多次参与故意毁坏财物、非法侵入住宅等暴力拆迁活动的张某辉、边某鹏、王某龙、耿某等人为第三层级人员。对于被临时纠集参加犯罪活动的第四层级人员，重点审查主观上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该组织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组织，并自愿接受其管理。根据以上原则判断，冷某昌、路某明、路某文等人，因系临时被纠

集，只参与一两次在外围“站场子”活动，平时跟李某梅没有从属关系，年龄较小、社会阅历浅、参与时间短，系为谋生而误入该犯罪组织，主观上不明知是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成员。

（四）准确区分集团犯罪和个人犯罪，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本案的第四个焦点问题，李某梅作为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否应当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所有个案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全部罪行”应该是指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而非犯罪集团成员实施的全部罪行。本案所涉犯罪集团内部管理松散，部分成员为了牟取个人利益，利用李某梅在临淄区“大姐大”的名声为非作歹、聚众斗殴、肆意滋事。如骨干成员常某仲纠集多人单独成立的地下“出警队”，既参与李某梅犯罪集团故意毁坏财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又单独实施了十起强奸等犯罪行为，形成了以常某仲为首要分子的另一个恶势力犯罪集团。又如骨干成员曲某在组织之外实施聚众斗殴一次，寻衅滋事一次，造成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犯罪后果。但上述行为李某梅并不知情，也未组织、策划、指挥或参与实施，上述犯罪行为不是为集团利益所实施，与组织利益无关，事后也并未得到李某梅的追认，对该犯罪集团的发展壮大没有帮助作用。综上，对于上述非其本人组织、领导、参与实施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李某梅不应对其集团成员实施的上述个人罪行负责。

### 【典型意义】

（一）从严惩治拆迁领域黑恶势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拆迁作为城市发展改旧建新的重要环节，关乎群众切身利益。“黑拆迁”的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参与，“不明身份社会人员”组成的犯罪集团进行助拆、逼签、暴力强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应当依法惩处。对笼络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在拆迁领域中多次实施暴力或者“软暴力”强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违法犯罪活动，影响未拆迁居民正常生活，造成群众心理恐惧和恐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尚未达到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造成重大影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标准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二）依法准确认定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和集团成员。在办理黑恶案件中，要准确区分没有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业务行为和犯罪行为，以及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的犯罪和为集团利益实施的犯罪。对于集团成员为了个人利益，实施的该犯罪集团意志以外的其他犯罪，应由个人负责，不应认定为犯罪集团所犯的罪行。对于参与犯罪集团时间短、参与程度不深、对犯罪集团缺乏明确认识、具体行为情节较轻、个人获利较少的，不宜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